

周洪宇
王文虎 著

炎黄国祭论

炎黄新认识丛书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识丛书

炎黄国祭论

周洪宇
王文虎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炎黄国祭论 / 周洪宇, 王文虎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7. 2

(炎黄新认识丛书)

ISBN 978-7-5334-7508-6

I. ①炎… II. ①周… ②王… III. ①祭礼—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892. 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8731 号

炎黄新认识丛书

Yanhuang Guoji Lun

炎黄国祭论

周洪宇 王文虎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79615 83726908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11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7508-6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序

周洪宇

近年来，“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2014年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领导小组在众多庆典中同意湖北、陕西等省保留举办“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这将炎黄公祭活动提升到了离国家祭祀很近的层次。此后，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两会”的议事平台上，凡是涉及炎黄祭祀的地方，比如湖北、湖南、陕西、河南等地都有“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呼声，并且，这呼声已经变成了一个学术问题，相关争鸣性的文章频频见之于《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

作为历史学出身、目前从事相关研究并担负一定实际工作的我，对此理论和实际问题自然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文虎同志则是炎帝故里湖北随州人，对炎黄祭祀也素有兴趣。

我过去曾撰写出版《文化是一种力量》等专著，对有关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文虎同志也曾著有《随州文化探源》《神农氏世与随州史前文化》等论著，二人均有一定前期积累。为探讨此问题，我从2015年底开始提出构思，并在2016年2月专门邀请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晏昌贵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家龚胜生教授、汉江师范学院汉水文化史专家潘世东教授、湖北省委党校文化史博士马凌和文虎同志等，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建议。在此基础上，2016年3月，我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建议》（第1929号建议），从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可行性以及操作性等方

面提出了“将拜祭炎黄上升为国家级拜祭”的建议，得到了许多代表委员的热情响应和大力支持。全国“两会”结束后，我深感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更为扎实的学术研究。于是，最初的人大建议案变成了“炎黄国祭论”这样一个学术性课题。为了做好这个课题，我与文虎自5月份起先后专程赴陕西、山西、河南、湖南等地对课题相关内容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为“炎黄国祭论”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8月，我们还在《湖北社会科学》发表了《炎黄国祭论》一文，表明了我们对这个争论性问题的学术态度和基本立场。该论文实际上是本书的论纲。经过我们两人近一年的共同努力，就有了这本《炎黄国祭论》。

在“炎黄国祭论”研究过程中，我们以“探究历史真相，作出价值判断，推动当代文化建设”为指导思想，坚持“属于历史的还原给历史，属于传说的留给传说”的原则，在探究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炎黄文化及其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作出价值判断，从中摄取对今天有用的东西，并以此推动我国当前文化建设。我们的研究试图将事实研究与价值判断、理论构建与实践对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方法论上坚持多维视野，将史料与考古、神话传说，与民俗材料以及现实的经验观察统统纳入研究范畴。从史料、考古以及传说中，探究远古的“社会”，从民俗以及经验观察中分析现今的“人类”，力求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同类研究有新的拓展。我们还试图处理好炎黄祭祀中的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基本原则是国家为主兼顾地方，包容并行，合作共赢；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基本原则是论理以明炎黄国祭的合理性，操作以明炎黄国祭的可行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这个问题解决得完美与否，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关系处理得是否得当。当然，由于时间仓促，本书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提出批评。

“炎黄国祭论”这个课题，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中共湖北省原省委书记、现天津市市委书记李鸿忠，及罗清泉老书记，王晓东省长，省政协主席张昌尔，原省政协主席王生铁，原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丁凤英，湖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和文化史专家熊召政，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会

记、著名历史学家马敏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曾婕书记以及福建教育出版社黄旭社长和成知辛主任等人的关心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6年11月于武汉东湖之滨

目 录

概论	1
第一章 祭祀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10
第一节 祭祀活动及其特征	10
第二节 祭祀的对象与原则	22
第三节 祭祀的种类、内容与形式	32
第四节 祭祀文化的发展	40
第五节 祭祀的价值与意义	43
第二章 作为文化英雄的炎黄二帝	49
第一节 论炎黄之为文化英雄	49
第二节 炎帝神农氏的传说	52
第三节 轩辕黄帝的传说	65
第四节 炎黄之间的关系	73
第三章 炎黄子孙与中华统绪	79
第一节 多元一体格局内的中华认同	79
第二节 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始祖文化	88
第三节 炎黄二帝与中华文化之魂	93
第四节 炎黄精神的大同追求：中华民族的归依	102
第四章 炎黄祭祀中的文化认同	108
第一节 炎黄祭祀中民间层面的认同	108

第二节	炎黄祭祀中的官方认同	118
第三节	炎黄祭祀的国家认同	128
第五章	炎黄祭祀史略	135
第一节	炎帝祭祀史略	135
第二节	黄帝祭祀史略	146
第三节	炎黄合祭史略	155
第六章	炎黄国祭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	159
第一节	从炎黄祭祀到人民英雄祭祀：复兴以民为本的思想	160
第二节	炎黄国祭与当前社会信仰价值的构建	167
第三节	炎黄国祭与社会主义理想观构建	175
第七章	对炎黄国祭论几点异议的辨析	185
第一节	炎黄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血缘祖先，还是人文初祖？	185
第二节	炎黄国祭能否体现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心理认同需求？	188
第三节	炎黄国祭也是苗族人民心理认同的需求	190
第四节	炎黄国祭与公权力运用的合理性	195
第八章	实施国祭炎黄的系统工程	198
第一节	炎黄国祭切实可行	198
第二节	构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202
第三节	完善国家祭祀礼仪系统	208
第四节	创立炎黄国家祭祀模式	214
第五节	将炎黄祭祀申报为世界“非遗”	216
主要参考书目	219

概 论

最近几年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至少两次使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个术语，一次是把“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与“黄帝陵”联系起来，一次是把“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系起来。前者涉及了炎黄祭祀问题，后者涉及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是这样讲的：“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可见，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既然黄帝陵等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那么，其间必定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因此“炎黄国祭论”是一个大题目，一个可以深度挖掘中华民族最深精神追求的题目。在进入课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讲清三个问题：一是“炎黄国祭论”这个课题提出的背景；二是对炎黄国祭问题应该放在怎样的学术平台上进行考量；三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以及本书的结构安排。

近年来，“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话题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热议着，这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它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灵光一现而偶然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是有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的。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左”的思潮。以怎样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传统文化，在那时出现了“批判继承”与“抽象继承”之争，结果是“批判继承”占据上风。本来，“批判继承”的本意是主张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有选择地继承，但是后来被极端化了，在极左思潮中，它被演绎成两个字，就是“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最主要的儒家思想，是在被否定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的。这样一来，传统文化研究如果不是批判，就成了令人望而却步的禁区；体现传统文化的祭祀如炎黄祭祀，更是成了不可逾越的雷池。

然而文化如流，在传而统之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你可以来个抽刀断水，但是文化之流却任你如何抽刀，它总是依然故我地从过去向现在流淌着，向将来奔腾着。所以，即令是在“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横扫一切的时代，民众还是同过往一样，过着自己的民俗，仍同过往一样，祭祀着炎黄二帝，哪怕是将此祭祀当做地下活动来进行。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是不平凡的。这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序幕。伟大政治时代的开启往往有一系列文化事件为其先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一年，中国文化史上发生了许多令人振奋的事件，其中有一些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这年9月，在一声惊雷中，沉睡于地下达两千年之久的曾侯乙编钟重见天日。这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谓是旷古绝音。编钟敲起来了，这是祖先赠给未来盛世的第一道乐音，这也是传统文化复苏的先声。不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肃清

封建主义余毒”“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传统文化还处在被批判的话语框架中。到了1985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不关系问题提出来了，在这个视野内，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得到重视与推崇。1987年，有一个名叫周共·王德樵的美籍华人将一幅《炎帝神农画像》，献给了当时的湖北随州市厉山镇政府，这为湖北地区研究炎帝神农文化提供了良好契机，从此对炎帝神农的地下祭祀转到地上公开化了。然而当时主流的话语更多地还是强调了“反封建”“肃清封建主义余毒”，当时的文化学术界也出现了反传统的思潮，“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论调出现了，电视纪录片《河殇》将之推向了高峰。事情很快就发生变化，1989年以后，中国迎来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内在价值得以被重新审视，此时主流的声音强调了传统文化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精神支柱”，“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张出现了。传统文化研究热起来了，也火起来了，学者们比如哲学家张岱年等人对传统文化的特征以及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等问题做了许多探讨。与之相应的是，炎黄文化研究也臻于“热火”。1993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了，包括湖北在内的相关地区相继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成立，有力推进了炎黄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严峻挑战。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不受动摇，这是个重大问题。找到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大公约数是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在此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受到了重视。这使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发生了由“破”到“立”的转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被纳入“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中，并且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渊源问题也提出来了，继而进一步确立了“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进入21世纪后，发达国家借助其经济优势，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致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文化安全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从文化民族性和文化软实力的视角来看待

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价值与作用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自觉。此时，国家强调中国传统节日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意义，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等等。研究传统文化，不能不涉及炎黄文化，而当它与中国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后，在节庆的形式下，对炎黄二帝的祭祀活动已经由“四旧”变成了非常显著的课题。2002年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炎帝神农与民族精神”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被视为1992年中华炎黄研究会和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湖北随州举办的“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的“继续和深化”。^①

由此可见，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这个课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不仅如此，这个课题还牵涉一系列的学术问题，是一个必须放在学术平台上考量的大课题。因此，从学术回顾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

二

对炎黄祭祀文化的研究是伴随着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研究热而来的。它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炎黄文化研究是在学术层面进行活动的，比如，1990年随州地区炎帝神农活动，就是学术讨论，出版了两本论文集。在学术的层面，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一是处理了炎黄文化与信史的关系，即提出炎黄二帝是历史人物还是文化英雄的问题，取得了“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是中华民族象征”的学术共识；二是处理好了炎帝与黄帝的关系问题，克服了《史记》重黄轻炎，把炎帝写成侵略者的成见，使炎黄二帝并重了起来；三是进一步梳理了炎黄二帝对中华民族的巨大文化功绩，取得了“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共识；四是提出了炎黄文

^① 参看《炎帝神农与民族精神》，东方红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按：据此次研讨会论文集资料显示，当时的湖北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称此次研讨会为“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

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力图从炎黄文化中挖掘对现代化有用的东西；五是地方研究与国家层面研究并进。各地侧重于对炎黄二帝的生地与葬地的研究，他们很注重对炎黄二帝的祭祀问题；而国家层面的炎黄文化研究则侧重于对“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探讨。在展开学术层面的研究活动的同时，各地在实践的层面将炎黄祭祀由民祭推向了公祭，而且层级越来越高，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样的祭祀活动。这实际上是以实用研究的方式提出了“炎黄文化”与“传统祭祀”的结合问题，由此引出了“炎黄祭祀”这一新范畴。

“炎黄祭祀”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范畴。它似乎能将所有的传统文化问题集中起来。如果我们以“为什么要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问题形式来思考“炎黄祭祀”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炎黄二帝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他们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以及祭祀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同时，这个问题还涉及如何妥善处理地方与地方、地方与国家等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们关于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提案与议案，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背景深刻而又必须进行学术考量的重大课题。

当然，“炎黄祭祀”这个范畴的提出，在目前，其操作意义大于理论意义，也就是说，对它的认知我们目前处在“怎么做及做什么”的阶段，而对于“为什么这样做”则缺少深层次的思考。所以，当我们将“炎黄文化”与“传统祭祀”结合起来时，我们发现，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学术问题。它就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怎样对待包括炎黄祭祀在内的祭祀问题？为什么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此举对于现代国家治理究竟有什么重大战略价值与意义？所有这些问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特别是炎黄文化研究必须进一步思考的。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本书所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把“关于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提案或议案”简称为“炎黄国祭论”。在这个课题里，上述研究成果及所引发的新问题，都属于它所研究的对象。通过这种研究，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原因、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以及可行性等问题，都将在学术层面得到回答。换句话说，对“关于将炎黄祭祀上

升为国家祭祀的提案或议案”，我们是结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祭祀活动问题”进行研究的，因此，炎黄国祭论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培育，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在极左思维里，祭祀是“四旧”，属于封建迷信的范畴，得不到正常的学术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就连张岱年先生也这样说：“中国文化的缺点实在太多，但这都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而消失。如大家庭制和旧礼教，以后必将变革。”^① 传统祭祀无疑属于“旧礼教”的范畴，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它属于“中国文化的缺点”，是即将消失的东西。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实践层面虽然不再排斥祭祀，但认为祭祀属于宗教范畴，而无神论国家是不提倡宗教的。所以，祭祀问题在理论上也是被回避的现实问题。

研究祭祀问题的学者们，一般都不将祭祀问题当做一个现实问题来思考，他们甚至认为我们“身处祭祀活动渐已远离日常的时代，藉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回溯古代祭祀，难免隔膜”^②。祭祀问题被当做一个藉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回溯的历史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研究祭祀的论文或论著都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比如商代祭祀、秦汉祭祀、唐宋祭祀等等，都有学者做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被放在史学研究的范畴。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祭祀问题，很少有人纳入理论研究的范畴。我们也能看到《共和国祭奠》这样的书名，但它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将领的英勇事迹和生活点滴，而不是对祭祀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有个别论文强调共和国的祭祀问题，比如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冯晓霞的《祭祀活动的地位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论析》一文认为，祭祀是华夏典礼的一部分，蕴含着多重政治文化功能。按照祭祀内容的区别大致分为祭天、祭地、祭亡灵。传统祭祀的主要功能在于宣告正统、歌功颂德、维持稳定、祈求多福、告慰亡者等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祭祀内容和祭祀功能发生了较大改变，不再局限于政治范畴，更多体现在继承优良传统，传播积极的社会精神等方面。不过，这篇论文真正谈新中国祭祀的文字并不多，不超过 500 字。

^① 《张岱年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15 页。

^②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 页。

其实，我们不能回避共和国的祭祀问题。因为我们的日常并没有远离祭祀，祭祀仍然在我们的身边，仍然在对我们的生活发生作用。即使是在当代国家生活中，它也是大事。对已经故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逝者进行公祭等，不是小事；对人民英雄的祭祀，不是小事；对南京大屠杀中的死难同胞进行祭祀同样不是小事。可以说，祭祀事神圣，祭祀无小事。既然如此，在现实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就很难回避祭祀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对现实的祭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

近两年来，学者们在“炎黄祭祀”这个题目下对祭祀的思考与研究多了起来，而且也展开了学术性的争论，比如引人注目的炎黄祭祀的庙陵之争就是如此。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提出：“在国家层面，有塑造整个民族公认的标记和符号的需要，有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祭祀的必要性。”而如何拜祭呢？他认为，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而西安市副市长方光华则认为，从明到清，只发现中央政府在中央首府帝王庙和陕西黄帝陵对黄帝举行国家祭奠的记载，没有发现中央政府到新郑另外设立一个黄帝庙举行国家祭奠的做法。

有争论是好事，因为在这个争论中，我们已经涉及这个问题：应该怎样对待共和国的祭祀问题？争论的双方都主张从国家层面对待祭祀问题，这已经达成最大共识。我们在本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共和国的祭祀问题为切入点，清理从古代祭祀里的民本思想到现代人民英雄祭祀的发展脉络，并且将人民英雄祭祀与炎黄祭祀结合起来，从理论上构筑共和国的国家祭祀体系。它不同于传统的祭祀，因为传统祭祀是受唯心主义与帝王史观支配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像张岱年先生一样，认为它是旧礼教中的缺点；而我们的体系则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其基本概念是“人民英雄”，本源的东西是“人民”，所以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祭祀观”，

或者说是以人民为本的新祭祀观。

本书对“将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这个课题的研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祭祀观”即新祭祀观为理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课题分解成“炎黄”“中华文明”“祭祀”“国祭”等关键词，然后围绕这些关键词对课题展开研究。我们将课题分解为八个单元。第一单元：祭祀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阐明祭祀是国之大事，而炎黄祭祀是国家祭祀的重要对象，并且从祭祀历史发展的角度初步阐述“新祭祀观”，这就将本课题限定为以新祭祀观为学术基层的炎黄国祭论。第二单元：作为文化英雄的炎黄二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炎黄二帝确定为文化英雄。在这个概念下，阐明炎黄的功德传说，意在说明炎黄二帝作为国家祭祀对象的文化原因。第三单元：炎黄子孙与中华统绪。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炎黄文化”与“中华文明”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指出炎黄文化是中华统绪的源头，炎黄二帝因之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所以炎黄祭祀不仅是国之大事，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大事。国之大事，是政治层面的大事；而中华民族之大事，是文化层面的大事。第四单元：炎黄祭祀中的文化认同。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看到，在炎黄祭祀文化里，认同很重要。有个人层面的认同，也有地方层面的认同，还有国家层面的认同。对炎黄的祭祀只有上升到国家层面，才能真正将炎黄作为中华文明象征的意义显示出来，这实际上是对炎黄国祭之必要性的回答。第五单元：炎黄祭祀史略。前几个单元，我们对课题的研究基本上属于“论”的范畴，而在这个单元，我们将从史实阐明对炎帝从国家层面进行祭祀古已有之，对黄帝从国家层面进行祭祀也是古已有之，而且对二帝进行合祭，更是古已有之。所以从国家层面祭祀炎黄是中国的传统，是维护中华统绪的体现。这进一步说明了祭祀炎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六单元：炎黄国祭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通过这个单元，我们将进一步说明，从国家层面对炎黄进行祭祀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路径，因此本单元在进一步深化新祭祀观的同时，也强调了从国家层面祭祀炎黄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说明了从国家层面祭祀炎黄的紧迫性。第七单元：对炎黄国祭论几点异议的辨析。本书前几单元从正面阐述了炎黄国祭论的基本主张，但是对炎黄国祭

论的反对意见也是存在的。我们的研究不仅要从“立”的角度阐述炎黄国祭论的主张，而且还要从“破”的角度对反对炎黄国祭的不同意见进行辨析，以进一步说明和体现炎黄国祭论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第八单元：实施国祭炎黄的系统工程。前面几个单元谈的是理论，而在这一个单元，我们从操作的层面研究炎黄国祭论问题，主张构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完善国家祭祀制度”“确立国家祭祀模式”等。操作层面的研究，显示了从国家层面祭祀炎黄二帝的可行性，同时，进一步强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祭祀观即新祭祀观的论述。

贯穿在以上八个单元中的指导思想是探究历史真相，把属于历史的还原给历史，属于传说的留给传说。比如关于炎黄的生地、葬地等问题，应该是传说的范畴，而不能武断地说“我这里是，别处不是”。在探究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对炎黄文化及其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做出价值判断，从中汲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并以此推动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

因此，我们的研究试图将事实研究与价值判断、理论构建与实践对策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方法论上要有多维视野，将史料与考古、神话传说与民俗材料以及现实的经验观察统统纳入研究范畴，我们将这种视野多维的研究方法称为文化研究的“五行法”。从史料、考古以及传说中，我们可以探究远古的“社会”，从民俗以及经验观察中，我们可以分析现今的“人类”。在“五行法”中，对“社会”与“人类”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较同类研究都有新的拓展。我们的研究试图处理好炎黄祭祀中的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基本原则是国家为主兼顾地方，包容并行，合作共赢；处理史料（包括考古资料）与传说的关系，基本的原则是以史料为骨骼，以传说为血肉；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基本的原则是论理以明炎黄国祭的合理性，操作以明炎黄国祭的可行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炎黄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这个问题解决得完美与否，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关系处理得是否得当。